

中共現代化歷程與二十大後發展

龔祥生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壹、前言

習近平於 2022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二十大代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向大會做政治報告，當中明確提到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¹其中，「中國式現代化」這名詞雖然早在 1979 年 3 月 30 日中共「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就已由鄧小平提出，但習近平於此次報告中多次強調此名詞並將之納入黨章修正案中，顯見「中國式現代化」無疑是下個階段的重要發展路線。本文首先解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發展過程，探討中共現代化路線何以會曲折前行。接著分析隨著進入習近平新時代後，再到本次中共二十大的期間，所謂「中國式現代化」被賦予了何種的新內涵和目標，並造成了怎樣的內在理論矛盾。

貳、中共現代化的理論基礎

中共意識形態的理論建構是各時期路線政策的抽象依據，也代表歷代領導人所注重的精神內涵。隨著象徵領導人個人標誌的理論發表於全國黨代表大會，甚至進入黨章的那一刻，就確立了該理論進入了中國共產黨的神壇地位。這樣的建構過程自有其權力繼承和轉移的糾葛，但並非本文重點，本文主要關注於處理當下「中國式現代化」的源頭及其理論基礎，藉此釐清習時代所欲對接的現代化理論依據和隨之而來的正當性建構矛盾。

¹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網》，2022 年 10 月 26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1026/c1024-32551597.html>。

一、鄧小平已解決社會主義與現代化間的內在矛盾

由於毛澤東時代在中蘇決裂後無法走蘇聯式經濟現代化的路線，且因意識形態而長期敵視市場經濟，故毛傾向採取群眾運動的方式走出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但事實證明其「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政策都是陸續失敗的。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鬥垮繼承毛澤東路線的華國鋒之後，正式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並隨之開展有別於毛澤東的理論建構過程。

面對經濟現代化的議題，鄧小平必須處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何者為主體」、「社會主義和現代化能否相容」的二個問題，而他的解套方式就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回答前者的方式為不堅持公制作為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而是能夠兼容私有和混合等多種所有制，亦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同時互為體用，以此打破二元對立；²後者則是由鄧小平親自闡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³以發展經濟等同發展社會主義的論述作為解套。故從鄧小平所建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看，他發展現代化的最終目標在於達到「共同富裕」，這與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一致，所以在他手中已解決了社會主義和經濟現代化之間的內在矛盾問題，黨內左傾的基本教義派至此已無法再藉由意識形態阻擋他的改革開放政策。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拾「四個現代化」為實踐手段

在 1961 年 9 月，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中央在《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中提出要「把我國建設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首次在正式文件中出

²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台北：生智，2003），頁 22-29。

³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紀念網》，2017 年 1 月 19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7/0119/c410539-29036090.html>。

現「四個現代化」的內容，但隨著毛澤東將發展重心移到階級鬥爭上，他甚至親自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共領導的現代化發展路線完全偏離了客觀經濟基礎而失敗。鄧小平在 1982 年 9 月 1 日中共十二大開幕致詞時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代表已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期，並在中共黨章中修正總任務為：「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中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⁴意味著透過「改革開放」重拾毛澤東時期所未能真正完成的「四個現代化」。

1987 年中共十三大，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大會報告中，認定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特指中國尚處於「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此時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階級鬥爭」，而是「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就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提高勞動生產率，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並且為此而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這段話不但將「四個現代化」明顯地當作是克服經濟生產力不足的主要手段，更闡明包含政治制度和政策規範的「上層建築」，都須相互配合並一致投入「改革開放」的方向當中。1992 年中共十四大時進一步總結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經驗，在黨章修訂中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定義為「實現全黨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實行改革開放，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相結合」。⁵這使得鄧小平時期中國現代化路線背後的黨建理論得以完整建構，並確立起「以經濟建設

⁴ 〈中國共產黨章程（1982 年 9 月 6 日十二大通過）〉，《共產黨員網》，2021 年 9 月 27 日，<https://fuwu.12371.cn/2012/09/27/ARTI1348715767823434.shtml>。

⁵ 〈中國共產黨章程（1992 年 10 月 18 日十四大通過）〉，《共產黨員網》，2014 年 12 月 24 日，<https://fuwu.12371.cn/2014/12/24/ARTI1419399356558735.shtml>。

為中心」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路線核心，使後繼的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共領導人也不能挑戰質疑。

參、習時代的現代化

習近平於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從胡錦濤手中接下中共中央權力，正式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隨即展開屬於習時代的黨建論述。其首先考量的是對接鄧小平已樹立的「改革開放」方向，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本，然後逐步在此基礎上添加富有習近平個人色彩的理論建設，以走出有別於前人的現代化路線以及設定中國的發展目標，也希望藉此彰顯其做為第五代中國領導人的權威地位。

一、全方位的「第五個現代化」

習近平在接班之後，於 2013 年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立「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的同時，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因為是在「四個現代化」之後所擴增，所以又被稱為「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圍繞著 6 種體制的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準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⁶這當中的改革面向多元，從政治、文化、經濟、生態、科學無所不包，堪稱是全方位的現代化，可見習確實有與時俱進的注意到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惟生產力論」和「傾斜式發展」的各項弊病而有心改善。

⁶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2013 年 11 月 19 日，<http://www.scio.gov.cn/32344/32345/32347/32756/xgzc32762/Document/1415757/1415757.htm>。

二、以「共同富裕」為主軸的「中國式現代化」

在中共十三大時，鄧小平基於中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中國現代化目標設立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第一步，到 1990 年，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到 20 世紀末實現小康；第三步，到 21 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故在鄧小平時期已經完成了第一步。而習近平不但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設定目標為「到 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在 20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大會時，宣告已達到鄧小平所設定第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這一方面展現了對於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信心，但卻又凸顯出中國現代化朝向綜合實力上的提升，已不能滿足於小康而以，而是期許要在 2045 年真正的憑藉實力在世界上成為一流強國。

然而，當中共在建黨百年之際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再下一階段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自我期許就必須拉高，而不能像前階段僅以經濟上的「全面脫貧」為低標。如同前面所述，他將「中國式現代化」作為實現目標的手段，並包羅多面向試圖解決自改革開放以來所造成的各種環境、經濟、官民資本失衡和矛盾問題。回朔習近平執政後已多次藉由「反腐」打擊多名政敵和「軍老虎」，藉此鞏固權威的同時順帶撫平一般民眾對於權貴階層的不滿，後來對於中國演藝圈的逃漏稅、「失德藝人」的大規模整肅，也是相應爭取民心的配套作為。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黨章修改時，就注意到發展失衡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矛盾所在，並把原來黨章總綱部分的「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修改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⁷再從中共二十大時對黨章修改內容（表

⁷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共產黨員網》，2017 年 10 月 24 日，<https://www.12371.cn/2017/10/24/ART11508832982612968.shtml>。

1) 觀察，進入小康社會之後已基本消除貧窮，所以刪除相關文字，改以下個階段的用詞代替。但另一方面，由此可見在習近平的重視程度中，已經將經濟不平衡擺在經濟不發達之前，因此「共同富裕」的正式提出也引起了外界眾多關注。

表 1、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關黨章修改對照表

19 大時黨章	20 大修改
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消滅貧窮，達到共同富裕	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	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促進國民經濟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促進國民經濟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發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處負責人就黨的二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答記者問〉，《人民網》，2022年10月27日，<http://cpc.people.com.cn/20th/n1/2022/1027/c448334-32552714.html>。

「共同富裕」也在 2022 年的中共二十大報告中與「中國式現代化」相結合，包含在 5 個面向中：「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⁸因為習近平處處學習毛澤東，使得外界疑心是否會走向

⁸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

反改革開放的回頭路，故自然而然將重點擺在了關於「共同富裕」的相關配套措施。但本文認為，以現階段而言，中國因為改革開放而創造出了巨大的共同利益共享階層，尤其是「官僚資本主義」的興起，導致中共黨內不可能再走回左傾的老路，習近平也多次強調他要做的是「堅持對外開放」。故習近平可能以「共同富裕」作為新一階段的現代化主軸，一方面配合「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發展失衡的問題進行政治面的深入整理和解決，而國有和私有資本之間的對比失衡則依靠「國進民退」對私有大型資本集團進行整改，尤其針對富可敵國且握有大量個人資料的新興網商和科技製造業，都是其首先下手的目標。故可以想見，未來在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是依靠著多面向的現代化路線，以及從政經二方面更加深入的延伸中共統治力量，由上而下的逐步完成國力提升，中共的角色不再如過去放任民間資本發展只在危機時進行宏觀調控，而是積極的高舉「共同富裕」的旗幟擴大對於私有領域的滲透。

肆、結論

無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式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等名詞，都是習近平承襲自鄧小平而來，因此從習近平於十八大掌權以來，一路在鄧小平建立的基礎上朝「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擴充，並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正式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冠名改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寫入黨章，這是要凸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並稱「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⁹中共二十大報告中的「中國式現代化」也被強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所以作為手段的現代化路線雖相較

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網》。

⁹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共產黨員網》，2017年10月24日，<https://www.12371.cn/2017/10/24/ART11508832982612968.shtml>。

鄧小平時代有著更為廣泛的多元面向，但真正不變的原則只有中共領導這一項，故所謂的「中國式現代化」其實就是堅持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化。

綜觀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脈絡，中共領導人一直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只是毛澤東是以「階級鬥爭」為基礎，欲展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優越性而以公有制全面取代私有制，再以群眾運動方式進行現代化；鄧小平則是務實的認知到階級矛盾已非主要矛盾的情況下，以允許市場經濟共存的方式進行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習近平時代則是試圖調和二者，先從政治掌控上將治理能力進行現代化，再以「共同富裕」、「國進民退」方式解決過度放任私營經濟發展導致的社會失衡甚至可能出現「以商逼政」的問題，把現代化的主導權重新取回並抓牢，這或許可說是種「矯枉必須過正」的政治邏輯使然。

展望未來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可明確推論將在帶有一定急迫性下展開，除了要因應目前中國大陸內部因為新冠疫情、中美對抗、全球經濟、俄烏戰爭等短期因素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外，長期來看仍有內部隱憂難以快速解決。首先是「共同富裕」造成的內外投資疑慮難以解決，這配合國際產業斷鏈分化，可能進一步加速造成富人及產業外移。其次是越強調基於國家安全而由政府主導發展，則越可能造成決策錯誤後的政策災難，或是災難發生後是由人民承受苦果，例如在習近平堅持「住房不炒」後，相關配套政策造成爛尾樓風暴，後續卻是由購屋民眾和國企承擔，類似配合「共同富裕」的政策可能在未來持續出現。最後，習為了證明自己有能力勝任突破慣例的第三任甚至終生領導，勢必將作出更劇烈的動作或功績來證明自己，但歷史證明這樣的舉動往往都會陷入頭腦發熱的後果，因其個人權力穩固及中共的共犯結構而難有人出面踩煞車。故未來一旦無法藉由「中國式現代化」突破目前已見端倪的經濟困境，未來為轉移政策失敗的注意力也可能採取包含動武在內的極端

手段，將發展成何種局面仍有待觀察。

本文作者龔祥生為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所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共黨政發展、中共黨軍關係、中日關係、日本外交與安全戰略。